

# 全球智库半月谈

美国税改会使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吗？

知识产权或促进或破坏中美关系

欧盟-美国双边贸易关系中的脆弱领域

谈到数据隐私，我们并无真正选择

亚洲基础设施的数量与质量之争

俄国与西方的关系将走向何方

本期编译

安婧宜

曹园

丁丽伟

侯书漪

单敬雯

史明睿

申劭婧

伊林甸甸

杨茜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承担的编译项目，每半月定期发布。所有稿件均系网络公开文章，由项目组成员依据当前热点编译组稿。

##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 任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 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史明睿 科研助理

##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 长 张宇燕

召集人 徐 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 史明睿 邮箱: [iwepceem@163.com](mailto: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联系人: 许怡 邮箱: [naonao0619@163.com](mailto:naonao0619@163.com) 电话: (86)21-50815287 传真: (86) 21-50815265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24 楼 2409 邮政编码: 200122

免责声明:

《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 目 录

## 世界热点

## 美国税改会使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吗? ..... 7

导读：美国税制改革使美国的公司税率降低，但是并不会给中国企业或中国的外资企业带来很大影响，企业不会选择撤出中国。另一方面，中国的财政脆弱性增强，反而有可能采取加税或减少补贴的政策，对企业造成影响。

## 特朗普是否想打贸易战？——不妨先了解一下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以及 20 世纪 30 年代 ..... 9

导读：特朗普总统近来的言论和关税计划让人联想起斯姆特-霍利关税和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贸易战。本文将今天的关税与斯姆特-霍利关税进行了对比，阐述了五点事实。

## 全球范围内的改革浪潮促进增长了吗? ..... 12

导读：随着欧元区经济增长势头迅猛，一些人认为这说明危机期间实施的结构性改革已经发挥作用，这也使得人们对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促进长期增长再次展开辩论。本文采用了一种新颖的实证方法，即修订后的合成控制方法，来估算 40 年来全球大型改革浪潮的影响。

## 美国财政部汇率政策报告：再次错失纠正贸易不平衡的机会 . 15

导读：美国政府拥有实现贸易均衡所需的所有工具，而不用冒着贸易战的风险。不幸的是，一个关键的工具——财政政策正在向错误的方向迅速发展。

## 知识产权或促进或破坏中美关系 ..... 18

导读：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所有人都在关注特朗普最新的关税政策，但中国主要关注的是美国对其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的调查。当前正在进行的“301 调查”可能会使中美之间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要避免贸易战争，中美两国必须妥协。两国应该在它们共同的领域扩大交流与合作。

## 欧盟-美国双边贸易关系中的脆弱领域 ..... 20

导读：近日，美国政府宣布对进口的钢铁和铝材征收惩罚性关税，这再次引发人们对美国保护主义倾向的担忧。作者总结了美国与欧盟 28 国间的双边贸易关系，并分析了其中最脆弱的领域。

## 谈到数据隐私，我们并无真正选择 ..... 23

导读：五年前，斯诺登事件让我们开始考虑国家安全机构对网络信息和隐私数据的使用权限。如今，Facebook 事件也让我们意识到，网络信息安全不再是个体选择，因为这会对全体社会成员产生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网络信息安全的认识不足，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也偏离了应有的主题。

## “一带一路”倡议：下一阶段实施的战略 ..... 25

本文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演讲稿，由 IMF 官方网站提供。

## IMF 配额和治理结构的再改革 ..... 28

导读：再过几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成员国需要进行第十五次配额审查，目前美国拥有超过 15% 的投票权，可以否决增加配额的决议。但是，为了维持 IMF 的借贷能力，大部分国家希望增加配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渴望增加配额和投票权，使美国配额比例和投票权比例下降，不再拥有否决权。

## 经济政策

### 亚洲基础设施的数量与质量之争 ..... 32

导读：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数量与质量之争一直贯穿着所有有关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议题。在如今大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话题里，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尤为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作者认为，欧亚各国确实急需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但这些投资不仅要关注数量，更要关注质量。

## 战略观察

### 俄国与西方的关系将走向何方？ ..... 34

导读：近期，由于俄罗斯前情报人员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伦敦被神经毒剂毒害的事件不断发酵，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相互驱逐外交官的行动不断升级，双方对立情绪再一次加深。本文是 CFR 官网刊登的一篇书面采访，CFR 俄罗斯与欧亚研究方向的“乔治·凯南高级研究员”斯蒂芬·斯塔诺维奇认为，尽管特朗普的政策依然难以预料，但西方国家在对俄关系上展现出了更显著的团结，未来普京将更加孤立、承受更大的压力。

### 欧洲能拯救伊朗核协议吗？ ..... 37

导读：早在去年 10 月，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美国军方高级将领时就公开表示，伊朗没有遵守伊核协议“精神”。尽管目前尚不能确定美国是否会撕毁伊核协议，然而美伊关系在特朗普的多次强硬表态之下已然蒙上厚厚的阴影。特朗普声称欧洲必须在四个月内“修复”该协议，因此作者认为核协议是否能继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欧洲。在此期间，双方可以对协

定进行改进和补充，但前提是需要大西洋两岸的妥协；或者欧洲要做好美国退出的准备，与其他大国合作，继续维持该协议，但这势必要付出一定代价。

**沙特阿拉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安全伙伴 ..... 39**

导读：3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举行会面，在会谈中双方达成了包括坦克、战机等在内的武器销售协议，金额高达125亿美元。作者认为，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安全伙伴，而美国却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武器以及沙特的对美投资上，忽视了其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美国应与沙特开展更为积极的合作，共同维护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

**本期智库介绍 ..... 41**

## 美国税改会使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吗？

Alicia García-Herrero/文 史明睿/编译

导读：美国税制改革使美国的公司税率降低，但是并不会给中国企业或中国的外资企业带来很大影响，企业不会选择撤出中国。另一方面，中国的财政脆弱性增强，反而有可能采取加税或减少补贴的政策，对企业造成影响。编译如下：

美国税收制度变化已经在中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许多人担心，美国公司税率的减少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公司，或者说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会把业务转移到美国，享受新的税收优惠政策。

然而，这是极不可能的，原因如下：

首先，中国政府仍然控制着中国企业的行为，特别是企业的离岸行为方面，对企业的资本管制越来越严格。这不仅适用于国有企业，也适用于私企，例如打击一些标志性私企集团的海外资产收购。

即便是外国企业，当面临美国税收改革带来的利润返还或继续在中国经营的抉择时，他们也会选择继续在中国经营。

### 中国的公司税更低

中国公司税低是主要的原因，哪怕与美国税改之后的税率相比，中国的实际税收负担仍然较低。

事实上，中国官方提到的 25% 公司税是最大值。对于小型企业或非居民投资者而言，适用的公司税只有 20%。此外，如果公司的主营业务符合政府提倡的优先发展方面，例如高科技产业，实际公司税可以进一步减少到 15%，并且享受两年免税。除此之外，中国有非常灵活的税率，可以很容易地适应工业政策或打击国际税收竞争。例如，中国近期宣布对外资企业的利润再投资暂时免税。

中国的主要税收来源是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公司税只占中国税收总收入的 20%。然而，即使考虑到所有种类的税收，中国的企业税负仍低于美国。

根据 Natixis 研究机构计算，以中国 3000 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为基础，2016 年中国的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只有 17%，这甚至比美国的新企业所得税率 20% 更低。

### 中国的补贴更多

税收只占公司总开支的小部分。在中国，人工工资占企业支出的 35%，鉴于中国工资水平仍比美国低得多，企业没有把生产从中国转移到美国的额外动机。

最后，大多数中国地方政府仍然对外国公司提供补贴，尤其是对较大的外国公司，这进一步减轻了他们的净税负。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地方政府相互竞争，

吸引企业，创造本地区就业机会的方式。如果企业考虑离开中国转到美国，中国地方政府可以很容易地增加补贴以缓冲负面影响。

### 中国的赤字是大问题

美国的税收改革并不构成对中国留住企业的直接风险，即便对在中国的外国公司而言也是如此。还有更重要、更令人担忧的现实问题，即中国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

2016年中国中央财政赤字率达到3.7%，有可能进一步恶化。考虑到地方政府赤字也在不断增长，情况更加令人担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中国的整体财政赤字超过GDP的12%。

### 税收可能上升

在这样脆弱的财政状况下，中国没有进一步降低有效税率的空间。相反，考虑到政府扩大福利和社会保障基金的计划，中国应该增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将推动养老和医疗支出。

由此观之，中国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可能比从美国财政改革的威胁更加有害，因为它拖累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 中国财政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的财政改革亟需增加税基，为福利支出留出空间，应促进税收增加，减少其他支出，减少企业补贴和配合中国产业政策的其他补贴手段。中国政府的融资成本高速上升，表明投资者已经认识到，中国的财政状况存在问题。

改革迫在眉睫。中国改革的原因不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税制改革，而是自身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

---

本文原题为“Will U.S. Tax Reform Lure U.S. Companies Away from China?”。本文作者 Alicia García-Herrero 为 Bruegel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3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特朗普是否想打贸易战？——不妨先了解一下斯姆特-霍利 关税法以及 20 世纪 30 年代

Chad P. Bown 和 Douglas A. Irwin /文 单敬雯/编译

导读：特朗普总统近来的言论和关税计划让人联想起斯姆特-霍利关税和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贸易战。本文将今天的关税与斯姆特-霍利关税进行了对比，阐述了五点事实。编译如下：

特朗普总统称“贸易战争很好，而且很容易赢得胜利”。3 月 23 日，特朗普计划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并即将对 300 亿至 600 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特朗普的言论让人想起了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和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贸易战”。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于 1930 年 6 月 17 日签署成为法律，适用于数百种产品，将美国的平均关税从 38% 提高到 45%。全球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迷，贸易大战爆发。然而，这些事件之间的关系并不像通常描绘的那么简单。

以下五点是您需要了解的，关于斯姆特-霍利关税以及其对 20 世纪 30 年代和今天的影响。

### 1、斯姆特-霍利关税并未导致大萧条——或者说，反之亦然

1929 年 8 月是经济开始萎缩的转折点，从此经济进入大萧条时期。美国股票市场在 1929 年 10 月开始了史诗般的下跌，到 11 月中旬蒸发了近一半的市值。

然而，斯姆特-霍利关税并不是对经济衰退的回应。这一关税最初是在 1928 年设想的，当时美国经济仍在增长并且就业充分，众议院于 1929 年 5 月通过了该法案。

斯姆特-霍利关税也没有引起大萧条。直到 1930 年 6 月，胡佛总统才签署生效，使之成为法律。也就是说关税在经济开始衰退的近一年后才生效。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当美国银行体系在 1930 年底开始崩溃时，经济衰退才演变成了大萧条。

这与特朗普今天的关税提议相比如何？像 30 年代那样，宏观经济危机并非关税的诱因——美国的失业率为 4.1%，经济持续增长近 9 年，美国经济似乎不可能在 3 月 24 日陷入衰退——尽管 OECD 警告说，贸易保护主义会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风险。

## 2、关税征收之初的危害比其后期造成的影响要小

在斯姆特-霍利关税时期，美国政府以“每单位”的形式对约三分之二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例如每吨钢 100 美元或每磅奶酪 1 美元。

当时经济已经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因而关税的影响越来越大。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关税将进口成本提高了 10%。例如，对原价 1000 美元的一吨钢铁征收 100 美元的关税，但当钢铁价格跌至每吨 500 美元时，突然感觉关税税率是 20%。尽管政府只上调了一次关税，但价格的下跌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税变得日益繁重。

现在美国关税只有每单位 8% 左右，且通缩并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然而，特朗普的关税可能会带来其他问题。例如，新的关税可能导致钢铁行业工作岗位的流失。美国最后一家不锈钢啤酒桶制造商 American Keg Co. 已宣布裁员，并表示关税上涨会导致未来钢材价格上涨，裁员符合自身需要。由于钢铁和铝是非常重要的投入品，其成本升高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即保护主义的连锁反应。

此外，其他国家也可能会提高自己的钢铁和铝关税，这种情况在 2002 年 George W. Bush 总统对钢铁征收关税之后就曾经发生过。

## 3、一些国家提高关税，直接对美国进行报复

30 年代初，一些国家立即采取关税措施，作为对斯姆特-霍利关税的回应。当时的加拿大同现在一样，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因而被美国的行为所激怒，在 1930 年两次施加了报复性关税。尽管其他国家也对美国的行为进行了反击，但一场全球性的贸易战直到 1931 年才爆发，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由欧洲的金融危机所引起的。

今天的贸易伙伴也可能会对美国的出口品征收更高的关税，以作为回应。鉴于特朗普的关税，欧盟宣布了一个“再平衡”贸易关系计划。其他国家可能采取类似的行动，在 1 月份特朗普对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实施新一轮关税后的不久，中国就宣布，正在就是否对价值 10 亿美元以上的高粱进口征收新的关税进行调查。

## 4、贸易伙伴形成了集团——并排除了美国

斯姆特-霍利关税将美国排除在特惠贸易协定之外。1932 年在渥太华召开的会议上，英国建立了“帝国特惠”制度，对加拿大等前殖民地征收较低的关税。在斯姆特-霍利之前，约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出口产品销往英国和加拿大。这意味

着美国的小麦农民在英国市场面临关税，而加拿大的农民则享受到了帝国特惠；美国纺织业出口到加拿大也面临着关税，而英国出口商则无需支付。

今天，类似的模式似乎也正在出现。欧盟最近与加拿大和日本签署了协议；11 个环太平洋国家也有望实施修订版本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特朗普则在之前退出了 TPP。因此，缅因州的龙虾产业正在担心失去进入欧洲的机会，因为来自加拿大的竞争对手现在面临的是零关税；美国西部的养牛场在日本市场面临更严峻的形势，因为来自澳大利亚的牛肉只需支付较低的关税。

### 5、1934 年，国会将美国贸易政策的领导权交给了总统

国会在 1934 年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以部分解决斯姆特-霍利关税带来的问题。在接下来的七十年中，美国总统利用该法律赋予的权力，与合作伙伴协商降低关税，推进贸易自由化。虽然国会也授权了总统提高关税的权力，然而在特朗普政府之前，这很少导致新的进口保护。

特朗普的钢铁和铝关税是基于 1962 年《贸易扩张法案》第 232 条的国家安全条款。他根据 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进行调查后，对从中国进口的 300 亿至 600 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

因此，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提出立法，试图阻止特朗普提出的关税政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会是否会试图收回 1934 年交给总统的贸易政策领导权。

---

本文原题为“Does Trump Want a Trade War?—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Smoot-Hawley Tariffs and the 1930s”。本文作者 Chad P. Bown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和贸易谈判播客的主持人。Douglas A. Irwin 是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3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全球范围内的改革浪潮促进增长了吗？

Alessio Terzi, Pasquale Marco Marrazzo/文 申劭婧/编译

导读：随着欧元区经济增长势头迅猛，一些人认为这说明危机期间实施的结构性改革已经发挥作用，这也使得人们对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促进长期增长再次展开辩论。本文采用了一种新颖的实证方法，即修订后的合成控制方法，来估算 40 年来全球大型改革浪潮的影响。编译如下：

今年 1 月，欧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达沃斯联合向全世界发出政治信息：“欧洲又回来了”

在经历了近十年的经济不景气和衰退之后，最近欧洲经济的增长数据似乎支持了这一观点。去年，欧元区经济增长了 2.5%，这是自 2007 年以来最大的增幅。鉴于欧元区外围经济表现强劲，有人迅速得出结论——欧元区在危机期间实施的痛苦的结构性改革终于有了成效。而反对者则认为，目前的上涨是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和全球需求增长，或经济长时间衰退后的正常反弹导致，而所有这些因素与改革无关。

因此，一个重要问题由此出现：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是否有助于促进长期增长？

学者们的观点可能比人们想象的分歧更大。除多边机构认为改革方案的深度和广度将影响长期经济表现外，其他学派的思想依旧摇摆不定。例如，有些人认为改革之间存在重要的相互作用。因此，与葡萄牙和希腊进行的大规模改革方案相比，量身定制的干预更有可能促进增长（Rodrik, 2009）。

与上述意见不同者的观点一致，其他人认为好运似乎比好政策更重要（Easterly 等人，1993）。一些人强调成功的基础是实施政策的机构的质量。因此，与新兴市场相比，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会更好地发挥作用（Prati, Onorato and Papageorgiou 2013）。

在 Marrazzo 和 Terzi（2017）的文章中，我们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来对这些观点进行实证性检验。特别的，我们根据 Giuliano 等人（2013 年）提供的涵盖了 156 个国家在 40 年中实体和金融部门改革详细信息的数据库，以广度和深度作为衡量指标，确定了一些结构性改革的典型范例。

在该研究中考虑到的指标包括贸易，产品市场，农业和资本方面的自由化以及金融和银行部门改革。特别的，我们着重寻找某个国家实施的规模很大，并在

短时间内在至少两个上述政策指标进行结构化改革的例子（即所谓的“改革浪潮”）。这使我们确定了 1961 年至 2000 年间跨越六大洲的 23 次改革浪潮。

图 1 大致总结了我们的发现，它显示了实施改革前后和不实行改革条件（综合合成）下该国的平均人均 GDP 的变化趋势。这些信息与其他统计分析结合在一起表明，改革在短期内具有负面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图上也展示了最初的经济衰退如何与经济周期联系起来，以及在经济衰退期间实施改革的倾向，而不是改革本身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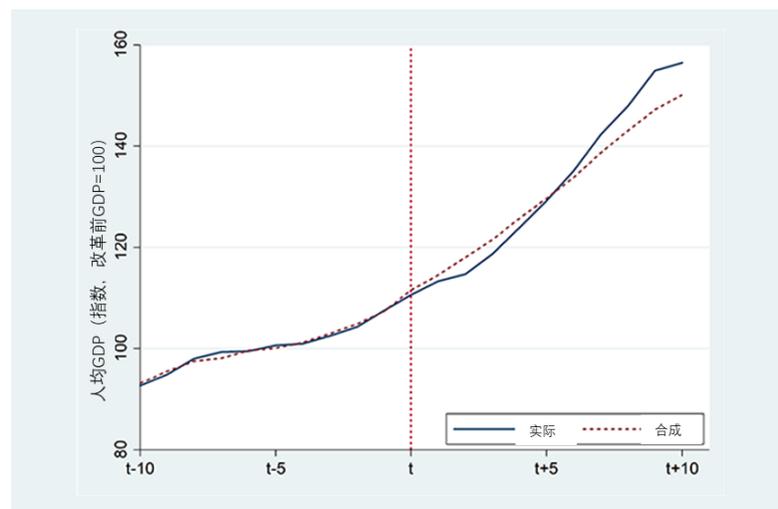


图 1 人均 GDP 趋势：改革进行后 VS 不进行改革

然而，实施改革的国家在中期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因此，改革浪潮开始 10 年后，人均 GDP 比不实行改革高出大约 6 个百分点。从这个角度看，在过去十年所谓的“大趋同”（Baldwin, 2016）时期，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显著缩小了。

我们强调，平均点估计掩盖了改革影响是高度异质的这一事实，特别是在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之间。表 1 显示了短期和长期内全体改革国家中改革对年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对于不实行改革的平均影响，并进一步进行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细分。

两种情况都证实了改革的整体积极影响（表 1）。然而，发达经济体从广泛的改革计划中获得的收益似乎比新兴市场少。而且，改革成效显现时间的分布似乎有些不同；那些拥有前沿技术，可能也拥有更好机构的国家，在五年内就可以看到改革收益，而新兴市场在较长时间后才可以看到成效。

	整体影响		
		长期影响	短期影响
23项改革：全样本	1.02%	-0.34%	1.56%
18项改革：新兴市场	1.12%	-0.65%	1.83%
5项改革：发达经济体	0.66%	0.80%	0.57%

表 1 相对于不改革，改革对年度人均 GDP 的平均影响

“结构性改革”是当下的热门话题，通常被视为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重新刺激增长的关键。但它真的有用吗？我们以包含了 40 年间六大洲国家为样本的新颖的实证方法表明，平均而言，改革是有效的。因此，关于欧洲当前经济增长加速至少部分是通过危机期间实施的改革推动的看法似乎是正确的。

然而，平均点估计掩盖了改革影响很大程度的异质性。即使在发达经济体中，在样本包含的五个改革实例中，也有一个国家（新西兰）人均 GDP 显著低于不进行改革 10 年后的数值。因此，与 Rodrik（2009）的意见相一致，我们认为对国家特定因素的考虑似乎在提高改革成功率上更重要。

---

本文原题为“Do Wide-Reaching Reform Programmes Foster Growth?”。本文作者 Alessio Terzi 是 Bruegel 的研究学者，Pasquale Marco Marrazzo 是欧洲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8 年 3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美国财政部汇率政策报告：再次错失纠正贸易不平衡的机会

Joseph E. Gagnon/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美国政府拥有实现贸易均衡所需的所有工具，而不用冒着贸易战的风险。不幸的是，一个关键的工具——财政政策正在向错误的方向迅速发展。编译如下：

特朗普总统将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放在第一位。然而，他已把达成这一目标的责任下放给那些缺乏有效工具来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官员。与此同时，传统上负责贸易不平衡的机构——财政部——刚发布了另一个半年度报告来谴责贸易失衡，但在美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却没有提供任何提示。事实上，美国政府拥有实现贸易均衡所需的所有工具，而不用冒着贸易战的风险。不幸的是，一个关键的工具——财政政策正在向错误的方向迅速发展。

### 关税是错误的工具

美国政府错误地将贸易赤字归咎于美国出口障碍。美国官员要负责公平对待美国出口商——商务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已宣布征收关税来报复各个国家的不良行为。毫无疑问，美国许多出口商的确遭到了外国政府的不公平待遇。我的同事查德·布恩（Chad Bown）撰写了针对不同国家的贸易案件以及政府处理这些问题的战略的利弊。然而，正如我去年在文章中所解释的那样，外国的贸易壁垒和美国关税对美国整体的贸易均衡基本上没有影响。

### 财政和汇率政策影响贸易平衡

对于整体贸易平衡而言最重要的政策是财政政策（联邦预算赤字）和汇率政策（外汇干预和外资管制/税收）。由于贸易收支反映了与其他国家的交易，他国的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也对美国的贸易赤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财政部的外汇报告完全侧重于他国的政策如何影响其贸易收支不平衡，并从而暗示美国的贸易失衡。

财政部报告的最好方面是分析了全球贸易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盈余国家的国内消费不足，尤其是中国和德国。中国和韩国的社会安全网的改善和德国的基础设施支出将同时满足内部需求和重新平衡全球贸易。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很长一段时间期中，美国的大额财政赤字为世界带来了净收益，同时也导致了美国的贸易赤字。但财政部的报告对美国财政赤字在贸易不平衡中的作用却怪异地

保持了沉默。随着 2017 年 12 月以来的减税和开支增长，这一角色的作用将变得更大。

### 为什么财务报告没有发现汇率操纵国？

在讨论汇率政策时，财政部拒绝将任何国家归类为汇率操纵国。财政部将其分析局限于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被命名为操纵国的国家必须符合三个标准：

(1) 经常账户盈余至少占 GDP 的 3%；(2) 外汇干预至少占 GDP 的 2%；(3) 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至少为 200 亿美元。这第三个标准并不是汇率操纵的合适指标，因为导致美元升值的货币购买会导致美国从所有国家的进口量都有所上升。

在最近的一篇博客文章中，特莎·墨里森 (Tessa Morrison) 和我使用了弗雷德·伯格斯特 (Fred Bergsten) 与我合著的书中提出的标准，将香港、以色列、澳门、挪威、新加坡、瑞士、台湾和泰国等 8 个国家确定为 2017 年的汇率操纵国 (地区)。除泰国外，这些国家均没有达到财政部的双边贸易顺差要求。泰国没有达到美国财政部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的定义，尽管它是美国的第 20 大双边出口和货物进口国 (如果欧元区被视为单一贸易伙伴，则是第 15 大)。

看来财政部似乎避免指认任何国家进行了汇率操纵。如果双边盈余标准降低到 100 亿美元、按流量来衡量外汇干预、“主要贸易伙伴”被定义为包括前 20 名的贸易伙伴，那么财政部可能会发现瑞士、台湾和泰国是汇率操纵国 (地区)。然而，这三个国家 (地区) 以及莫里森和我确定的其他五个汇率操纵国的合并外币购买额在 2017 年为 2990 亿美元，对美国 4660 亿美元的贸易 (经常账户) 赤字的贡献大约是 1000 亿美元。汇率操纵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它对美国的大部分贸易赤字不负有责任。

财政部保留六个主要贸易伙伴的监测清单，认为值得继续审查。名单上的五个国家超过了财政部的三个标准：德国、印度、日本、韩国和瑞士。这份名单还包括中国在内，是因为其双边盈余特别多。一个更合适的监测清单应侧重于有经常账户盈余和大量外汇干预历史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瑞士、台湾和泰国。印度不该出现在监测名单上是因为它有经常账户赤字，其外汇干预旨在减少它的不平衡。德国也不该列入名单，因为它不干预外汇。虽然德国是造成全球贸易失衡的重要国家，但其他的政策才应该对贸易顺差负责，包括财政政策。

### 没有提及的是美国应如何应对贸易赤字

迄今为止，美国财政部报告最欠缺的是不承认美国拥有任何减少贸易逆差所需的政策工具。扩大或支持过度贸易顺差的外汇干预确实是有害的，应该被谴责。但是减少大量贸易赤字的干预是有益的，并且完全符合国际规则。以平衡的美元政策取代强势美元政策以期尽量减少全球失衡的措施在很久以前就应该实施了。这一政策将包括稳定外汇干预，并可能需要向外国的资本流入征税，以尽量减少造成非可持续贸易失衡的美元汇率波动。

然而，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扭转灾难性的美国财政扩张计划。如果不立即采取纠正措施，美国经济将会过热到几十年未见的程度。繁荣的经济将吸引更多的进口，进一步扩大贸易赤字。同时，应暂时避免或尽量减少旨在削弱美元的政策，因为它们会加剧经济过热。

---

---

本文原题为“Treasury's Foreign Exchange Report: Another Missed Opportunity to Address Trade Imbalances”。本文作者是 Joseph E. Gagnon，他是 PIIE 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4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 知识产权或促进或破坏中美关系

Alex He/文 杨茜/编译

导读：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所有人都在关注特朗普最新的关税政策，但中国主要关注的是美国对其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的调查。当前正在进行的“301调查”可能会使中美之间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要避免贸易战争，中美两国必须妥协。两国应该在它们共同的领域扩大交流与合作。编译如下：

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九十年代初，两国就面临知识产权的争端。二十年后，这一争端再次爆发。尽管所有人都在关注特朗普最新的关税政策，但中国主要关注的是美国对其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的调查。实际上，当前正在进行的“301调查”可能是贸易战的转折点。

这轮贸易战最显著的特点在于特朗普政府采用的贸易边缘政策。中国已经意识到特朗普政府的坚定立场。特朗普正在极力推动单边和有争议的贸易政策。最近，他对进口钢铁、铝以及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关税就是最好的证明。

尽管美国钢铁业认为，中国的廉价产品涌入国际市场，对美国钢铁行业产生负面影响。但实际上，中国仅占美国进口钢材的 2%。对中国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对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的“301调查”。

301 条款赋予美国贸易代表广泛的权力，他可以不通过国会，直接对外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采取措施。美国正在对中国涉嫌侵犯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的做法进行调查；如果一家美国公司希望与中国公司以合资企业的形式在某些领域开展业务，它通常需要分享其知识产权（如商业秘密或工业品外观设计）。“301调查”的结果可能会使美国对中国进行广泛的制裁，例如对其出口实施高额惩罚性关税（例如半导体和电信设备等高科技产品）以及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这将对中国不利，并会引发中国报复性的贸易措施。

先前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可以阻止中国实施其知识产权政策；TPP 的高标准可能会迫使中国在一段时间内对知识产权政策进行整改。但特朗普政府退出 TPP 协议后，美国通过开展“301调查”转而采取更直接的惩罚措施。

如果调查发现中国的政策存在问题，那么中国将被迫立即采取行动对政策进行整改，否则将面临惩罚性关税。美国采用的这种以美国国内法律为基础的策略，绕过了 WTO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规定。美国政府的惩罚性关税和非法绕行的做法可能会引起中国的报复。

中国试图缓和与美国的紧张贸易关系，但知识产权调查的进行表明这些努力并没有什么作用。例如，中国承诺通过取消在中国的保险、银行和证券行业的外国投资限制来进一步开放其金融部门。早在 3 月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华

盛顿会见了白宫的高级贸易官员。他要求美方任命一位代表来处理中美关系，并希望美方优先列出对中国的需求清单。但据媒体报道，双方并未谈妥。

也许报复行为是中国与特朗普政府进行平等磋商的唯一途径。与加拿大和欧盟不同，中国在最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被称为战略竞争对手。随着特朗普暂停全面经济对话这一高层交流机制，中美之间不再有任何谈判机制。如果没有这一缓冲机制，贸易战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因为中美几乎没有途径可以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在试图缓和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时，中国已经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针对大豆、苹果产品、波音飞机和好莱坞电影等进口美国商品进行针锋相对的报复。

美国政府认为，高度风险厌恶的中国领导人将尽一切可能来避免贸易战，这可能是使得特朗普总统过于强硬的因素。虽然中国领导人确实是风险厌恶的，并且非常重视与美国保持稳定的经济关系，但在面对来自美国单边、强行的贸易战争威胁时，他们决不会让步。美国政府激进的行为很可能导致中美之间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301 调查”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要避免贸易战争，中美两国必须妥协，这意味着要找到一个更微妙的方式来解决知识产权争端。过去三十年来，两国经济日益相互依存是中美关系的基础和稳定器。美国采取一些贸易措施（如“301 调查”）来影响这种稳定是不值得的。相反，两国应该在它们共同的领域（例如：能源、金融、基础设施投资和农业等）扩大交流与合作。中美应寻找共同的价值观，而不是挑起纷争，这对双方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有利的。

---

本文原题为“Intellectual Property Will Make or Break US-China Relations”。本文作者 Alex He 为国际创新管理中心（CIGI）的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3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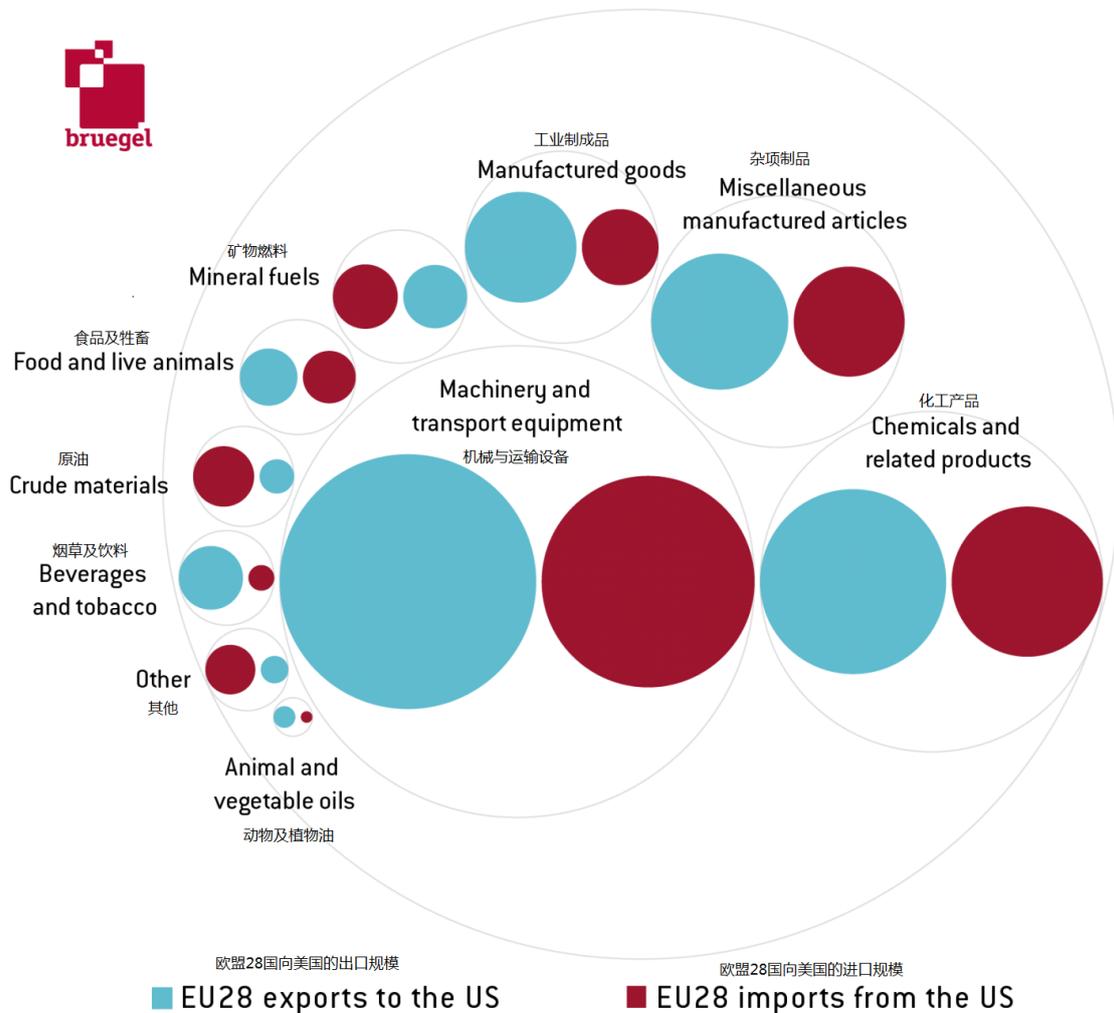
## 欧盟-美国双边贸易关系中的脆弱领域

Francesco Chiacchio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近日，美国政府宣布对进口的钢铁和铝材征收惩罚性关税，这再次引发人们对美国保护主义倾向的担忧。作者总结了美国与欧盟 28 国间的双边贸易关系，并分析了其中最脆弱的领域。全文如下：

鉴于美国最新的针对进口钢铁和铝材的惩罚性关税，以及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形势，我们有必要对美欧的双边贸易关系进行前瞻性分析。基于标准国际贸易分类法（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 SITC），我们在图 1 中展示了美欧双边贸易关系中前十大商品类别的相对规模。这些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Eurostat）公布的 Comext 数据库，我们在文中使用的是 2016 年更新的版本。

图 1 美欧贸易前十大商品类别的相对规模



由图 1 可见，除了矿物燃料和原油外，欧盟在大多数大宗贸易品里都对美国保持了顺差。双方贸易量最大的机械与交通领域（超过 508 亿欧元）和化工品领域（超过 293 亿欧元）则更是如此。

事实上，仅图 1 所展示的美欧双边贸易前十大商品就占到了美欧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我们在表 1 和表 2 中详细总结了这些商品的双边贸易规模。从表中可见，除了石化产品（从美国进口）和特种机械设备（向美国出口）外，其他类别的商品都同时出现在了两张表中。因此，相应地分析同样的商品在出口与进口间的差别就显得十分有趣。总体来说，欧盟 28 国在许多商品类别中都保持了对美贸易顺差，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包括道路车辆（365 亿欧元）和医药产品（166 亿欧元）。不过，欧盟也在其他一些领域与美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贸易逆差，这其中包括航空航天装备（127 亿欧元）和发电机械设备（65 亿欧元）。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还在其他一些领域对美国保持了规模庞大的顺差，这其中包括工业机械装备和有机化工产品。在这些领域，欧盟的相对顺差规模都超过了 100%，这意味着欧盟向美国出口的规模是其从后者进口规模的两倍以上。

表 2 欧盟从美国进口的前 10 大商品

Top 10 2-digit SITC EU28 imports from the US 欧盟从美国进口的前10大商品	Bln EUR 十亿欧元	% All imports 占总进口比例
Medicin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医药产品	31.68	12.65
Other transport equipment 其他运输设备	31.33	12.51
Power-generating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发电机械设备	28.83	11.51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and controlling instruments and apparatus, n.e.s. 专业、科学及控制用仪器及器具	14.99	5.99
Electrical machinery, apparatus and appliances, n.e.s., and electrical parts thereof 电气机械、用具及零件	13.33	5.32
Miscellaneous manufactured articles, n.e.s. 杂项制品	12.26	4.90
Road vehicles (including air-cushion vehicles) 道路车辆	11.08	4.43
General industrial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n.e.s., and machine parts, n.e.s. 一般工业机械、装备及零部件	10.23	4.09
Petroleum, petroleum products and related materials 石化产品	7.63	3.05
Organic chemicals 有机化工产品	7.35	2.93
Total 总计	168.71	67.36

表 3 欧盟向美国出口的前 10 大商品

Top 10 2-digit SITC EU28 exports to the US 欧盟向美国出口的前10大商品	Bln EUR 十亿欧元	% All exports 占总出口比例
Medicin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医药产品	48.26	13.28
Road vehicles (including air-cushion vehicles) 道路车辆	47.56	13.08
Other transport equipment 其他运输设备	22.79	6.27
Power-generating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发电机械设备	22.37	6.15
Electrical machinery, apparatus and appliances, n.e.s., and electrical parts thereof 电气机械、用具及零件	21.56	5.93
General industrial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n.e.s., and machine parts, n.e.s. 一般工业机械、装备及零部件	20.65	5.68
Organic chemicals 有机化工产品	19.18	5.28
Miscellaneous manufactured articles, n.e.s. 杂项制品	16.99	4.67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and controlling instruments and apparatus, n.e.s. 专业、科学及控制用仪器及器具	15.90	4.37
Machinery specialized for particular industries 特种机械装备	15.41	4.24
Total 总计	250.68	68.96

---

本文原题为“Which Sectors would be Most Vulnerable to EU-US Trade War?”。本文作者 Francesco Chiacchio 是欧洲智库 Bruegel 研究院的研究助理。在入职 Bruegel 之前，作者曾于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实习。本文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谈到数据隐私，我们并无真正选择

Stephanie Maclellan/文 安婧宜/编译

导读：五年前，斯诺登事件让我们开始考虑国家安全机构对网络信息和隐私数据的使用权限。如今，Facebook 事件也让我们意识到，网络信息安全不再是个体选择，因为这会对全体社会成员产生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网络信息安全的认识不足，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也偏离了应有的主题。编译如下：

斯诺登 2013 年信息泄露事件让我们开始思考国家安全机构有多大的权限使用我们的网络与电话数据。随之而来的公共讨论建立在我们需要担心政府对我们的隐私的影响的基础上。那些愿意牺牲隐私来保护社会环境的人会陷入一个怪圈：只有那些需要隐藏一些东西的人才会担心隐私问题与监控问题。

相反，五年以后，我们终于开始明白像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拥有许多我们的隐私数据，而这一点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这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本周，纽约时报和观察家日报报道了一家叫做 Cambridge Analytica 的机构收集了 5000 万用户信息。其中有大约 27 万用户授权将信息转送给第三方调研软件；而剩下的则在为允许的情况下授权的。2014 年收集的数据理应被用于研究，但是报道显示这些数据成为了 2016 年美国大选中发掘选民的重要基础，因为广告都被投放向那些最有可能对广告作出反应的观众。Facebook 停止了对 Cambridge Analytica 的服务，声称这些数据在几年前就应该被删除了。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面临着被世界各国政府责难的危机。“我们有责任保护你的数据，如果我们不能做到，那我们就不配为你服务”，他在声明中如是说。

但是这些这些发现都证明了主流媒体对于网上信息安全的讨论已经偏离主题了。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数据。是的，但问题不再是我们是否如此选择，而是我们为什么而奋斗。

毕竟，Facebook 否认了信息泄露。这是准确的：数据收集过程是合理的，经过了那些下载第三方调查软件的用户同意。Facebook 随后改变了隐私条款，防止第三方软件得到用户“好友”的信息。但这些 Cambridge Analytica 手中的数据都是通过正常自愿的程序收集的。

那些我们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信息——我们搞笑或者生气的自拍，我们的朋友，我们发布的帖子——可以泄露出我们的大量信息，这包括我们的政治倾向、性取向和心情。这些平台的算法可以让信息的内涵更加丰富。无处可藏的用户可能可以接受别人可以观看他们的聊天记录和隐私照片，但他们准备好那些政治机构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从而操纵他们的政治行为吗？甚至是通过煽动性广告来增加整个社会的极端性？

这正是问题所在。关于网络信息安全的讨论会指向同一个选择：如果你点击“同意服务条款”（你可能根本都没有阅读这些条款），你就是同意分享你的隐私数据。但是 Cambridge Analytica 事件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了解那些我们接受的隐私条款，甚至即使是平台软件也无法真正预测会发生的事情。或许，事实如纽约时报专栏所称的，“关于数据收集的授权机制是不可能被解释清楚并达成一致的”。

交友软件正在努力为用户创造更加易懂的隐私环境，但它们仍未提供关于各种用户数据会如何被使用以及让用户自主选择每一项隐私授权的清楚解释。这或许会使用户更可能选择是否要离开这些社交平台以保护信息安全。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对很多人来说，社交平台已经融入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了。关于使用消费者信息的规则，如欧盟会在五月投入使用的一般信息保护条款，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作用。

Cambridge Analytica 的新闻让我们直面信息安全已不是个体的选择，它会对社会全体成员产生影响，即便是那些不适用社交平台的人。真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应尽早实施，来保护那些可能在社交平台上被泄露的个人信息。

---

本文原题为“[When It Comes to Our Data Privacy, We Don't Really Have a Choice](#)

”。本文作者是 Stephanie Maclellan，为 CIGI 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8 年 3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一带一路”倡议：下一阶段实施的战略

Christine Lagarde / 文 IMF / 编译

导读：本文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演讲稿，由IMF官方网站提供。全文如下：

### 1、引言

易行长，各位阁下，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中文）！感谢您的热情介绍。

一年前，就在北京，我曾谈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承诺和巨大潜力。

初春时节，鲜花盛开，我们的再次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进展。时机非常恰当。

而这也是我今天想与各位讨论的内容：首先，“一带一路”的成果已初现端倪，绽放出了花朵；其次，同等重要的是，如何确保这一努力结出累累硕果。

### 2、“一带一路”的潜力

2013年，在习主席宣布“一带一路”倡议时，他将之形容成为一个开展国际合作的平台。从促进贸易到推动普惠金融，再到促进人与人的交流，这一倡议寻求拉近世界各地之间的距离。

“一带一路”将各群体相连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基础设施投资。

我们知道，良好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实现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个重大项目可以改变一个城市乃至整个地区的经济命运。

泰中高铁就是一个的很好例子，展示了基础设施带来的变革性影响。一旦建成，这条新线路将成为泰国第一条高铁，并将促进该国融入本地区的供应链。

另一个例子是哈萨克斯坦。近期，该国建成了制造业开发区，这已开始促进之前闭塞的地区之间开展贸易和交流。

“一带一路”拥有70余个参与国，因此很难准确估计所需的总投资规模，但每年的投资需求将会达到几千亿美元。

很明显，基础设施的需求十分迫切，且成果也初见端倪。换句话说，鲜花开始绽放。

但也有人担心，一些投资如果管理不当，可能会中途失败。

因此，我想重点谈一下“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两个挑战。

### 3、应对“一带一路”下一阶段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确保“一带一路”的项目仅在有需要的地方推进。

由于涉及大规模的支出，人们有时会面临项目甄选和招标过程中的诱惑。

全球经验显示，项目失败的风险和资金使用不当的情况总是存在的。

即便是选择了正确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也常会遇到困难。

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帮助在海外开展建设，那么它们可能会面临政治、法律和环境方面的新障碍。

未来的首要工作，是为这些情况做好准备，选择那些能真正填补基础设施缺口的项目，并以最高效的方式予以实施。

这与第二个挑战有关——关注稳健的财政政策。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为伙伴国提供其亟需的基础设施融资。

不过，这些项目也可能带来问题，导致债务水平上升。这可能会增加偿债成本，从而限制了其他方面的支出。其也可能带来国际收支方面的挑战。

公共债务已然很高的国家，应该对融资条款进行谨慎管理。这将防止中国与其伙伴国政府签署那些未来将有可能引发财政困难的协议。

幸运的是，我们知道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些潜在风险。此外，一些策略已被证明能帮助应对这些挑战。

一个好的起点是确保决策透明。在“一带一路”倡议内，各机构之间建立起一个总体框架，将帮助为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清晰的信息。

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一个“一站式服务”的机构，便可提供一个这样的框架。近期成立的、负责中国对外援助和“一带一路”工作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可能会发挥出这种作用。

数字工具也有所帮助。

例如在肯尼亚，政府近期启动了一个电子采购系统，这使评估工作更加高效、更易展开。

此类创新也有利于为项目选择建立公开的流程并营造公平的环境，而这对鼓励私人部门密切参与至关重要。

对于已获批准的项目，建立争议解决机制将能防止小问题演变成为大麻烦。

随着项目的规划和实施，满足环境标准可在各群体中建立信任，并使项目投资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这些政策能够确保“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取得成功。

基金组织在这些领域经验丰富，随时准备着在这些方面给予指导，特别是在帮助各国全面改善公共财政管理问题上。

通过对全体基金组织成员经济体开展定期评估（也就是基金组织所说的“经济监督”），我们将提供政策建议，帮助各国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和债务的可持续性，这也包括了投资不断增加的情况。

通过开展能力建设，我们将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成员国 实现经济体制现代化，建设人力资本，维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虽然我们今天的讨论主要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但我也很高兴地宣布新的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能力建设中心（CICDC）正式启动。该中心很快将开始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成员国官员提供一系列的培训活动，包括宏观金融培训课程。

#### 4、结论

最后，让我来谈谈这个季节的承诺。

今天采取的措施，有助于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取得预想成果，让我们所看到的花蕾最终盛开。

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确保在未来的许多年终将能收获累累硕果。

谢谢，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

本文原题为“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rategies to Deliver in the Next Phase”。本文作者 Christine Lagarde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本文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IMF 配额和治理结构的再改革

Edwin M. Truman/文 史明睿/编译

导读：再过几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成员国需要进行第十五次配额审查，目前美国拥有超过 15% 的投票权，可以否决增加配额的决议。但是，为了维持 IMF 的借贷能力，大部分国家希望增加配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渴望增加配额和投票权，使美国配额比例和投票权比例下降，不再拥有否决权。编译如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各成员国需要再次处理 IMF 金融资源充足性和 IMF 投票权分配（IMF 配额）的问题。基金组织成员国于 2010 年 11 月就基金组织配额和治理改革（投票权改革）达成了一项协议。作为第 14 次基金组织配额审查协议的一部分，成员国承诺提前完成第 15 次配额全面审查。但是，美国迟迟不同意 2010 年协议，一直推迟到 2015 年 12 月(Truman 2013, 2014, 2015)才签约。因此，直到 2016 年 12 月，IMF 主席才决定最晚在 2019 年秋季之前完成第 15 次审查（IMF 2017）。二十国集团（G20）在 2018 年 3 月 20 日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重申了这一承诺。

美国政府必须在未来几个月确定立场。本文指出，美国应通过决议在下次重新分配 IMF 成员国配额（即投票权）时，大幅增加基金组织配额，进一步改革基金组织治理结构。至少应该增加基金组织的总配额和新借贷安排（NAB），以取代 2020 年到期约 4500 亿美元的临时双边借贷安排，保持 IMF 未来十年贷款能力与现在一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的任何变化都需要成员 85% 的多数票通过。而美国拥有 16.5% 的表决份额，这意味着可以否决任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增加配额。如果美国不愿意在第 15 次审查时增加自己的配额，或者说美国国会不批准上述决议，那么美国也不应该阻止剩下的绝大多数成员国达成一致。如果美国阻止 IMF 配额增加，基金组织金融资源（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的绝对数量和相对规模在未来十年可能会缩小。这将威胁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对危机的能力，而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政策工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因此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特朗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未知的。但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大卫·马尔帕斯在 2017 年 11 月 8 日表示，美国财政部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拥有充足的金融资源来完成其使命，在即将进行的审查中，美国将维持对于 IMF 关键问题的否决权。但是，政府尚未就 IMF 第 15 次审查做出最终决定(Malpass, 2017)。

如果美国财政部坚持这种立场，就会破坏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领导地位，破坏美国继续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就国际经济、金融和货币问题进行合

作，破坏美国及全球金融、经济体系的未来稳定（Truman, 2017）。此外，这一立场似乎误解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在第 15 次审查中面临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可能拥有充足的金融资源，但未来十年会不充足。美国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资源保持现有水平并维持美国否决权的唯一途径是支持 IMF 大幅增加配额，最好也增加美国的配额绝对量。

### 背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覆盖广泛，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全球机构。IMF 配额的第 15 次协议包括两个部分：第一，IMF 执行委员会负责就计算 IMF 配额的新公式达成一致；第二，成员必须同意增加或不增加 IMF 总配额，如果增加总配额，就需要分配各国增长数量和占比。配额股份是国际货币基金投票权和治理的主要决定因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有金融资源约 18910 亿美元，189 个成员国为配额认购，38 个成员国的新借贷安排（NAB）约为 2650 亿美元，40 个成员国的双边借贷安排约为 4500 亿美元，双边借贷安排旨在增加基金组织的金融资源，以期在第 15 次配额审查中增加基金组织的配额。此外，2022 年美国参与 NAB 将到期，续约必须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如果美国不同意在 2019 年增加基金组织的配额，那么续约也不会容易。双边借款安排将于 2020 年到期，如果其他国家也拒绝延长其 NAB 承诺，IMF 的金融资源将减少近一半。

### 未来十年 IMF 的金融资源是否充足？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基金组织的金融资源增加了三倍多，从 2008 年底的不足 4000 亿美元增加到 2017 年底的约 1.4 万亿美元。到 2000 年底，基金组织的金融资源总额占世界 GDP 的 1.13%。截至 2008 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资源以美元计算略有增加，但缩减至全球 GDP 的 0.62%。在 2009 年 4 月的伦敦 G20 峰会上，成员国同意将 NAB 增加 5000 亿美元。该决定于 2010 年 3 月正式达成一致（IMF 2010b），并于 2011 年 3 月生效。2009—2010 年度约 2500 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双边借贷纳入了国家咨询委员会。目前，IMF 的金融资源为 14,070 亿美元，约占全球 GDP 的 1.77%。

在未来十年内，IMF 的资源是否足以“履行其使命”？这不是一个能肯定回答的问题，但有点与其考虑有关。

第一，目前基金组合的现有资源不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念，即“配额认购是基金融资的基本来源”（IMF 2016）。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资源不到一半来自配额认购。这表明应该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并且减少对借来的资源，特别是双边借贷的依赖。要想使目前的配额申购与 NAB 承诺之间的比例保持不变（约 70% 的配额和 30% 的 NAB 承诺），IMF 配额需

要增加约 3150 亿美元，达到 10060 亿美元，增加比例约为现有配额的 50%。如果美国维持目前的份额（17.4%），那么美国的配额需要增加约 520 亿美元。另外，如果美国维持目前的 NAB 份额（15.5%），那么需要增加约 200 亿美元投入。

第二，如果今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资源水平一直维持到 2022 年，占全球 GDP 的比值将缩减为现在的四分之一，至 1.38%。

第三，到 2022 年，基金组织不太可能保持现有的金融资源水平。一个原因是 IMF 的双边借贷安排在 2020 年到期。第二个原因，澳大利亚前驻 IMF 代表 Sterland 在谈话中指出，目前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双边借贷的成员不可能在 2020 年后续约。

第四，2020 年是美国大选年，2019 年 IMF 第十五次配额审议可以体现美国的态度，但如果美国打算在 2022 年 11 月之后续约现有的 411 亿美元借贷计划，就需要在 2021 年 11 月之前通过美国国会重新授权。届时，美国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

第五，2010 年的第十四次配额审查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较发达经济体成员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了 2.8 个百分点的配额份额（60.5 至 57.7%）和 1.6 个百分点的投票份额（57.9 至 56.3%）。2010 年后，有一批落后国家加入 IMF，通过第十五次审查重新分配 IMF 配额和投票份额会进一步促进 IMF 治理改革。但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不希望改变现有份额，如果美国反对改变，欧盟成员国跟随美国的决策。

### **美国是否应在第 15 次审议中阻止 IMF 增加配额？**

美国应该支持增加 IMF 配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多数成员至少希望增加 IMF 配额和 NAB 资源，弥补 2020 年到期的 4500 亿美元双边借款，维持基金目前的贷款能力和 70% 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占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的增加也需要通过增加近年来增长最快的国家的投票权来促进 IMF 治理改革，投票权应该随配额总量增加而变化。在第 15 次审查中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总量增加将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资源大幅度减少。

### **美国是否应该扩大自身在 IMF 的配额？**

如果基金的普通成员国赞成 IMF 的配额大幅增加，并且美国不会就这一增长达成协议，那么美国将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放弃否决权，不增加配额；第二种，保持否决权，增加一定的配额；第三种，不确定是否保持否决权。

第一种方案，在 IMF 增加配额以维持与 NAB 比例的情况下，随着 IMF 的 NAB 增加，美国在 IMF 的配额份额将下降到 12% 左右，其投票份额将变为 11%。

如果美国不能够再争取别国 4 到 5 个百分点的投票权来阻止它认为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决议，美国就是放弃了自己的否决权。

第二种方案，美国国会批准增加美国在 IMF 的份额，使美国的投票权保持在 15% 以上，依然保留美国的否决权。

第三种方案，美国有可能同意增加美国的配额，以维持其超过 15% 的投票权份额，但国会不一定通过。如果国会不及时采取行动，那些已经同意的国家的配额将会增加，而美国的投票权份额将下降到 15% 以下。美国将有可能失去阻止某些 IMF 决策的能力。

本文认为可能性由大到小为方案 3（有风险的保留否决权）、方案 1（放弃否决权），最后是方案 2（保留否决权）。美国将无法阻止执行增加 IMF 配额的协议。目前，欧盟 28 个成员国的配额份额为 30.3%，合并投票份额为 29.6%，而美国为 17.4% 和 16.5%。（脱欧后，欧盟股份分别下跌至 26.1 和 25.6。）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少采取正式表决，但欧盟国家的意见通常是事先协调的。

### 结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全球货币合作的中心机构。70 多年来，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一步推动美国的政策目标，促进国际金融稳定。除其他活动外，其预先配置的资源使 IMF 能够及时应对其成员的大小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核心。虽然有人认为它不完美，但它依然是现在最好的工具。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七十年成功的背景下，美国应该支持在第 15 次审议中大幅增加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至少可以使双边借款的资金更为持久。这至少可以确保基金组织的财政资源在未来十年内不会下降，可以平衡基金组织配额资源与借入资源。它还将有助于通过重新分配配额和投票股份，加快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即使美国当局不愿增加在基金组织的配额，他们也应该允许总配额增加，并使美国的配额份额和投票份额下降到单一国家拥有否决权（15%）以下。

## 亚洲基础设施的数量与质量之争

Jonathan E. Hillman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数量与质量之争一直贯穿着所有有关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议题。在如今大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话题里，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尤为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作者认为，欧亚各国确实急需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但这些投资不仅要关注数量，更要关注质量。全文如下：

对于全球各地的经济学家而言，本周的华盛顿就仿佛举办时装周的巴黎。在本周召开的世界银行年度春季会议里，全世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们将汇聚一堂，共同讨论思想，形成政策，并对未来的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经济学家们曾在这个场合里提出过公平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以及负责任的增长等诸多理念。的确，发展与增长是全世界大多数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们所共同关心的话题，不过针对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标的质疑也是早已有之。早在半个世纪前，罗伯特·肯尼迪就曾经质疑说：“无论我走到哪里，大家都在谈论国民生产总值（GNP）。但 GNP 并不能反映出我们所拥有财产的美感，也不能反映我们婚姻的宝贵。它不能体现公共辩论中所闪现的智慧成果，也不能体现我们公职人员的恪尽职守。GNP 将所有一切量化为一个冰冷的数字，却遗漏了那些真正宝贵的内涵。”

尽管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有无所人曾提出过对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的渴求，但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标一直是政策制定者们所最为关注的。比如说，就在罗伯特·肯尼迪批评 GNP 的几年前，正是他的哥哥约翰·F·肯尼迪率先将 GDP 列为了联邦政府的政策目标。此后的 50 年间，正如 David Pilling 在他的著作《增长的幻觉》中所总结的那样，对 GDP 的痴迷迅速在各国政策制定者中流行开来，其中有些人甚至在 GDP 指标的误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扭曲的经济政策。

时光荏苒，在如今最为热门的亚洲基础设施的竞争中，这场质量与数量的论战再一次成为经济学家的焦点话题。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欧亚大陆至少需要万亿美元规模的投资来复兴该区域的基础设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为这一需求注入了强大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几乎所有观察人士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至少会带动一万亿美元左右的投资，注入沿线超过 70 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正如 GDP 指标存在显著的局限性，这个“万亿美元投资”的总量指标也只能给我们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不能向我们提供更多、更重要的信息。这些投资能帮助到沿线国家那些最需要的人吗？这些投资能确保被投入切实可行的项目吗？这些投资会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负面效应吗？这些复杂的问题，都不可能由几个简单的数量指标来衡量。

如果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只重数量而忽视质量，那么其导致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美国在 150 年前修建跨美洲铁路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教训。当时，美国铁路的修建者们重视速度而忽视安全，在规划线路时漠视对沿线环境的保护，同时其财务状况也相当不透明。这一切导致的后果，除了使得工人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外，还使得权贵阶层中饱私囊，而公共财政则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最终，这些错误的决策也间接导致了两次金融危机。在中国主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今天，他们有必要从美国的历史中吸取足够教训。

事实上，也确实有国家在亚洲基础设施的竞赛中主打质量牌。2015 年，日本的安倍晋三就发起成立了“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Quality Infrastructure），日本计划向这一方案提供 2000 亿美元的投资，以帮助他国兴建更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工程。2016 年，日本利用主办 G7 会议的东道主优势，游说各国通过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安全性、可持续性、可靠性等。

不过，无论是日本，还是其他“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拥趸们，他们都躲不开两大核心问题：一是高质量意味着更高的投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高质量被视作昂贵、豪华的同义词。不切实际地强调质量，无疑将使得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丧失可操作性。二是落实这些原则性意见并非易事。就拿“可持续性”为例，这一个简单的词汇就可以涵盖从环境保护到融资、维护等诸多广泛的议题。说说总是容易的，但诸如日本这样的“高质量基建”的拥护者们，要如何确保这些原则在几十个不同的发展中国家里得到切实贯彻呢？

因此，更具操作性的方案应该是：在各大国际场合中推行一套具体的衡量和监控工程质量的国际标准。这些标准不仅将有利于明确高质量基础设施的具体指标，更有助于各国的决策者们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也就是说，在这场数量与质量之争里，我们既要强调质量，但也要引入数量化的标准，从而使质量指标更为明确、可行。

---

本文原题为“Asia’s Infrastructure Contest: Quantity vs. Quality”。本文作者 Jonathan E. Hillman 是美国保守主义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资深研究员、政治经济学方向首席研究员，同时是其“连接亚洲”项目的研究主管。本文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俄国与西方的关系将走向何方？

Stephen Sestanovich / 文 丁丽伟 / 编译

导读：近期，由于俄罗斯前情报人员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伦敦被神经毒剂毒害的事件不断发酵，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相互驱逐外交官的行动不断升级，双方对立情绪再一次加深。本文是CFR官网刊登的一篇书面采访，CFR俄罗斯与欧亚研究方向的“乔治·凯南高级研究员”斯蒂芬·斯塔诺维奇认为，尽管特朗普的政策依然难以预料，但西方国家在对俄关系上展现出了更显著的团结，未来普京将更加孤立、承受更大的压力。

作为对前俄罗斯间谍在英国领土上的中毒事件的回应，特朗普总统已经下令驱逐数十名俄罗斯外交官，并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美国和其他二十多个国家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来对付莫斯科。在一次书面采访中，CFR的斯蒂芬·斯塔诺维奇说，尤其是在欧洲，统一的行动是一个“对普京的真正的警告”。他说，与此同时，随着特朗普新组建的国家安全团队的成立，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很可能会表现出“更大敌意”。

### 特朗普政府的这些举措有多重要？

传统上，像这样的驱逐行为被限制在一个政府在自己的领土上看到敌对国家情报人员的令人反感的行为。通常会有一到两个回合的报复，然后事情就会恢复正常。很明显，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模式的一部分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和许多盟国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但我们也希望看到其他的变化。请记住，尤其是在英国，有很多人呼吁收紧与洗钱和俄罗斯人将财富从西方国家转移进出的能力相关的政策。不到两周之前，美国对其干预选举施加了新的制裁。美国官员也抱怨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对民用基础设施（尤其是电网）的网络威胁。

我们所听到的是对俄罗斯的一系列更广泛的不满。外交信息是：俄罗斯已经不再是欧洲文明社会的一员。它的行为就像一个局外人并且也将会被这样对待。如果这是让欧洲各国政府更满意的信息，那么一段时间内，美俄关系将不会恢复正常。

### 这如何反映了政府对俄罗斯政策的内部讨论？

如果你问专家和内部人士关于政府上周对俄罗斯政策的内部讨论，大多数答案都将描述出一个混乱而分裂的景象。请记住总统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电话，

尽管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建议不要向这位最近的连任的俄罗斯领导人表示祝贺。一些人甚至认为，正是特朗普对此次泄密事件的愤怒，促使他更快地把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辞退。

但是，如果普京从那次通话中得到了任何鼓励——以及由此带来的后续——他现在必须重新考虑。新的高级国家安全人员队伍肯定比以前更加敌视俄罗斯——并且更有可能让总统和他们保持一致。在他下次打电话给普京的时候，将有一个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和一个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侧，他们更有可能让特朗普听从他们的建议。

**一些欧盟国家驱逐了俄罗斯外交官而一些国家并没有。欧盟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分歧有多大？**

欧盟从未在如何处理俄罗斯的问题上意见一致，但过去四年也没谁想要推动欧盟解除制裁。相反，即使许多成员对制裁有不同意见，欧盟政策也一次又一次地保持了团结。各国愿意把分歧摆在一边，接受德国人的领导，听从美国人的建议。

如果有什么的话，现在我们看到是那种团结在深化。毕竟，本周的驱逐是在向一个与欧盟渐行渐远的国家展现团结。而且最近与欧盟有些不合的波兰人，显然在此事上起到了带头作用。

在让欧洲人对于美国将向何处去疑惑了一年之后，我们也看到了来自华盛顿有力支持。除了驱逐行动本身，所有这些都是对普京的实实在在的警告，告诉他他的政策不起作用。

**你如何看待未来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

认为俄罗斯和西方关系无法恢复的观点是错误的。许多欧洲领导人希望与莫斯科保持关系而不要变得过于敌对。德国社民党中一直存在着缓和派。意大利新政府也希望尽快修补关系，甚至放松制裁。欧洲南部总体上比北部更为同情俄罗斯。而且，只要特朗普还是总统，美国的政策将难以预料。

尽管如此，多数西方国家政府对普京产生了新的怀疑，并更加确信普京是个问题而非解决方案。

**要改变俄罗斯的行为，北约和欧盟还需要做什么？这些外交动作看起来对普京影响甚微？**

人们往往低估了北约和欧盟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调整了对俄政策。在过去四年中——也就是自乌克兰危机开始——围绕增加国防开支、推动前沿部署以保护新盟友的共识已经逐步成型。能源政策变化已使俄罗斯更难运用天然气供应的武器。在限制其他的俄罗斯手段方面则进展较少，从洗钱到黑客、虚假情报以及——我们近期才发现的——神经毒气。但几乎所有案例的方向都是一致的：问题更加明确并讨论反击的途径。相比于几年前，普京更加受到孤立，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

本文原题名为“[What’s Next for 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本文作者为 Stephen Sestanovich，是 CFR 俄罗斯与欧亚研究方向的“乔治·F·凯南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欧洲能拯救伊朗核协议吗？

Dalia Dassa Kaye、James Dobbins/文 曹园/编译

导读：早在去年 10 月，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美国军方高级将领时就公开表示，伊朗没有遵守伊核协议“精神”。尽管目前尚不能确定美国是否会撕毁伊核协议，然而美伊关系在特朗普的多次强硬表态之下已然蒙上厚厚的阴影。特朗普声称欧洲必须在四个月内“修复”该协议，因此作者认为核协议是否能继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欧洲。在此期间，双方可以对协定进行改进和补充，但前提是需要大西洋两岸的妥协；或者欧洲要做好美国退出的准备，与其他大国合作，继续维持该协议，但这势必要付出一定代价。编译如下：

近期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与唐纳德·特朗普的会晤中，再次敦促美国尽快解决伊朗核协议问题，否则就放弃该协议。而这位美国总统似乎一直都希望选择放弃，毕竟他说过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协议”。不久我们就会知道他是否能如愿以偿了。

2015 年美国、俄罗斯、中国、欧洲和伊朗签署同意伊朗核问题协议，然而 2017 年 10 月以来，特朗普一直表示，美国准备退出该协议。尽管所有其他方面都认为协议正在起作用，但总统给了国会 60 天的时间来改进或扼杀它，他们没有选择。1 月中旬，特朗普放弃了核制裁，这是该协议得以延续的必要步骤，但他威胁说，如果欧洲在 4 个月内不“修复”该协议，他将撤回这个决定。那么从现在开始到 5 月中旬，欧洲能否拯救伊朗协议呢？

欧洲可以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来解决特朗普在 1 月份讲话中提出的对该协议的担忧，特别是在导弹研发、监察和日落条款等方面。

我们最近同来自欧洲智囊团的同事一道提出了具体建议，这些建议虽然在政治上可行，但需要大西洋两岸的妥协。这些措施符合欧洲明确表示的立场，即它们同意改进或补充该协定，但不会重新谈判。不用说，协议的其他各方——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远不像美国那么担忧和敏感，因为国际社会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多项评估的支持下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即伊朗正在遵守该协议。

我们还提出了若干措施，包括利用协定内的机制来加强核视察。我们建议执行会考虑在今后延长该协议的附带协定以及举办区域合作论坛，以处理协议范围以外的更广泛的区域安全问题，特别是导弹发展问题。

据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寻求与欧洲各方达成类似的协议，该协议被称为《联合综合行动计划》。华盛顿的欧洲伙伴是否会同意，结果是否足以让白宫感到满意，还有待观察。

当然还存在 B 计划：如果特朗普政府退出该协议，欧洲可以与其他大国合作，在美国不参与的情况下继续维持该协议的活力。这需要一个“软性退出”，以确保美国同意推迟次级制裁的执行，以便欧洲和其他国际公司能够继续在伊朗进行贸易和投资，而不至于令他们付出失去美国市场的代价。这样的安排还可以避免跨大西洋贸易战，以及重新实施欧洲封锁制裁，因为那样一来势必会伤及无辜。

如果欧洲和其他国家能够在不引发跨大西洋严重分裂的情况下维持该协议，那么美国今后还可以重新加入。但要使这一后备计划发挥作用，伊朗必须在美国离开后继续参与该协议。可谁也无法对此做出保证。

伊朗最近表示，如果协议不能给伊朗带来预期的经济利益，它可能会退出。伊朗领导人，包括伊朗最著名的核协议支持者哈桑·鲁哈尼总统，在最近几个月全国各地发生大规模抗议后，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内压力。鲁哈尼未能实现人们的高度期望，即核协议将有助于为普通的伊朗人带来经济救济。伊朗人目前正面临着高失业率，他们已经对腐败的治理失去耐心。

即使该协议还没有正式破裂，但特朗普威胁要退出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已经对该国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了寒蝉效应。这种失望情绪可能只会削弱公众对该协议以及推动该协议的领导人的支持，让那些躲在幕后的强硬派有机会指责美国，并转移人们对其自身失误的注意力。

不管有没有美国的参与，欧洲都可能会寻求维护伊朗核协议。而伊朗则会将其垮台的责任推给华盛顿。如果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找不到共同的前进道路，结果很可能是伊朗重新启动核计划，并发动跨大西洋贸易战争。

---

---

本文原题为“Can Europe Save the Iran Nuclear Deal?”。本文作者为美国兰德公司中东公共政策中心主任、政治学家 Dalia Dassa Kaye 和高级研究员、外交和安全主席 James Dobbins。本文刊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 RAND 官网。[单击此处可访问原文链接](#)

---

---

## 沙特阿拉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安全伙伴

Anthony H. Cordesman/文 曹园/编译

导读：3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举行会面，在会谈中双方达成了包括坦克、战机等在内的武器销售协议，金额高达125亿美元。作者认为，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安全伙伴，而美国却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武器以及沙特的对美投资上，忽视了其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美国应与沙特开展更为积极的合作，共同维护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编译如下：

我们似乎忘记了沙特阿拉伯是实行中东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安全伙伴。以色列的安全无疑是美国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但它在该地区的大多数军事行动（与伊朗打交道，或者直接打击像ISIS和基地组织这样的暴力极端主义运动）中没有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看来，由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注重国家内部稳定，它们在该地区的影响急剧减少，伊拉克和叙利亚已然自顾不暇，我们的欧洲盟国的力量投射能力正在下降，土耳其在该地区的作用也越来越成问题。

当然，沙特阿拉伯需要美国，这是事实。其军队设施力量正在稳步改善，这正是因为美国在该地区创造了一种力量平衡，威慑伊朗的同时帮助沙特阿拉伯战胜了来自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威胁。此外，美国的武器运输和军事演习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美国也需要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现在是确保石油稳定流出海湾地区的最关键伙伴。虽然美国基本上不再需要直接进口石油，但随着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它仍需从严重依赖海湾石油出口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进口石油。换句话说，尽管直接进口石油的需求稳步削减，但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在持续增加。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武器以及沙特对美投资上，而忽视了沙特阿拉伯自2003年以来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淡化了双方在遏制伊朗方面进行合作的必要性。

沙特阿拉伯的改革和经济发展计划对维护其自身稳定和该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沙特需要美国的鼓励和理解，如果没有外部支持它就无法有效地执行这些计划。分担责任论已经变得荒谬，沙特阿拉伯不能被视为美国每一次有需要时的现金来源。沙特阿拉伯已经将其10%以上的经济用于安全，这种开支太高了，美国应注重采取更好的办法，使其与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海湾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更有效率、成本更低。

伊朗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在处理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计划、海湾航运的不对称威胁以及在该地区扩大军事影响力等问题上，美国和沙特拥有至关重要的共同目标。不仅如此，美国迫切需要一些好的办法来处理伊拉克和叙利亚问题，这将有助于实现恢复和持久稳定，与此同时还要尽可能限制伊朗和俄罗斯的影响，改善和稳定同土耳其的关系。毫无疑问，沙特阿拉伯是我们关键的潜在伙伴。

美国尤其是国会成员需要记住一点，同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也门战斗中一样，我们在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争中也面临着许多军事问题。削减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武器运输，可能会使沙特忽视美国帮助建立的更具杀伤力的空中武器系统，这会导致美国失信于人。

我们需要在也门达成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让沙特阿拉伯与联盟脱钩。这种脱钩对也门的军事和人权事务不利，还会导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对伊朗、基地组织和也门境内的其他恐怖主义运动束手无策，更无助于也门恢复稳定和发展。

美国应尽可能说服萨勒曼结束导致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卡塔尔分裂的分歧，并缓和与阿曼的紧张关系。与武器出售相比，海湾南部国家在处理伊朗和恐怖主义问题上更具团结性，它们可以为美国提供更多帮助。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萨勒曼王储的访问，停止再做表面文章和仅仅关注交易。在未来十年内，美国极不可能在沙特阿拉伯找到一个更好的改革领导者，也不可能找到一个致力于以符合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共同利益的方式改善沙特安全的国家。

---

本文原题为“Saudi Arabia is a Critical American Security Partner in the Middle East”。本文作者为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研究专家 Anthony H. Cordesman。本文刊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本期智库介绍

###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http://www.chathamhouse.org/)

###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RAND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8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3 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